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冤假错案遍国中
冲破阻力
重大决策
洗雪「文革」个人沉冤
党政军部门冤案的平反
平反全国各地的重大冤案
平反各类反革命错案
平反共和国最大冤案
平反历史的沉冤

沉冤昭雪

——平反冤假错案

Chenyuan
Zhaoxue

董宝训 丁龙嘉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沉冤昭雪

——平反冤假错案

Chenyuan
Zhaoxue

董宝训 丁龙嘉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国新
装帧设计 丁明

沉冤昭雪

——平反冤假错案

董宝训 丁龙嘉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铁四局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0千

版次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212-01585-7/D·269

定 价 14.00元

印数 00001—1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昭雪沉冤的强烈呼声与 “左”倾势力的重重阻挠	1
一、冤假错案遍国中	1
二、两大不容回避的错案	3
三、华国锋设置障碍	12
四、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18

第二章 冲破阻力	21
一、《把“四人帮”颠倒了了的干部路线是非 纠正过来》	21
二、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	24
三、为错划右派分子平反	29
四、部分冤假错案陆续获平反	33

第三章 重大决策	42
一、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与陈云发言	42
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47

0026/05

三、其他重大平反决定	52
四、“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确定	59

第四章 洗雪“文革”个人沉冤	63
一、“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冤案的平反	63
二、彭德怀、陶铸平反昭雪大会的召开	70
三、杨、余、傅冤狱得昭雪	87
四、“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冤案的平反	93
五、贺龙冤案彻底平反	103
六、各地冤案的平反	108

第五章 党政军部门冤案的平反	121
一、撤销中联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 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结论	121
二、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	127
三、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131
四、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134
五、为“中宣部阎王殿”和“总政阎王殿” 冤案平反	138
六、为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 外国死人部”正名	143

第六章 平反全国各地的重大事件、案件	149
一、“三家村”冤案的平反	149
二、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平反	156
三、云南“滇西挺进纵队”和“赵健民 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两大冤案的平反	162
四、内蒙古“新内人党”冤案的平反	178

第七章 平反各类“反革命”错案	183
一、为思想解放的先躯遇罗克平反.....	183
二、为高举真理火炬的张志新平反.....	191
三、为活着的张志新式的人物董秀芝平反.....	201
四、为捍卫真理的勇士史云峰平反.....	206
五、为忧国忧民之士李天德平反.....	213
六、为挺身敢言之士屠德雍平反.....	219

第八章 平反共和国最大冤案	223
一、“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223
二、“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	230
三、令人发指的迫害.....	235
四、“历史是人民写的”	243

第九章 平反历史沉冤	247
一、“胡风反革命集团”沉冤昭雪	247
二、“潘杨事件”冤案终获伸冤	257
三、刘伯承、肖克、李达等人获平反.....	266
四、“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获平反	271
五、张闻天、邓子恢冤案平反.....	274
六、马寅初、杨献珍等著名学者的平反.....	282

第一章

昭雪沉冤的强烈呼声与 “左”倾势力的重重阻挠

一、冤假错案遍国中

1949年10月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但冤假错案这一历史现象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在共和国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阴霾笼罩的时刻。人们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共和国历史上这样一个年代——“文革”时代。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一个令人痛心的年代。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将“左”的错误推向极端，大肆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①

^①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首先将矛头指向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认定，江青、康生制造了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诬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诬陷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谢富治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名单。仅在这4份名单中，就有103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52位人大常务委员，76位政协常务委员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嫌疑”、“特务嫌疑”。这些被诬陷的人受到残酷迫害。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8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2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4人，中央军委副主席6人，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11人。

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负责人也惨遭厄运。仅以北京、上海为例，北京市遭到诬陷、迫害的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达13人，其中，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被最先打倒，市委书记刘仁、邓拓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上海市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12人遭到迫害，其中，市委书记陈丕显被打倒，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广大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劳动模范、先进分子被强加各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爱国民主人士被打成“特务”、“间谍”，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被扣上“假典型”、“工贼”的帽子。至于那些敢于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志士，则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而受到逮捕、判刑乃至枪杀。

据统计，“文革”中，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

被审查的干部占当时干部总数的 16.3%，其中 11 个单位审查面在 30% 以上。人民解放军中，有 8 万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 人被迫害致死。各级公、检、法中，遭诬陷迫害致死的有 1565 人。在全国，仅因“恶毒攻击”罪被判刑的就有 10 万多人。

在基层，同样是冤假错案迭起。河北省某县，因“新国民党”冤案，造成 2200 多人被关押，400 多人致死，530 多人致残，1500 多人被扫地出门。而该县人口仅有 12 万。天津市某厂，在大抓“叛徒、特务、走资派”中，制造了 27 起冤假错案，被迫害的干部、职工达 934 人。

上述数字还仅仅是指“文化大革命”而言，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为“左”倾错误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牵扯人数也在 100 万人以上。

“左”倾错误的长期延续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乱党乱国，造成了数不清的冤狱，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不知有多少人惨遭迫害，蒙受不白之冤！

二、两大不容回避的错案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在饱受“文革”苦难的人们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后，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喜悦心情。

一位老干部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国四届人大代表、著名教授闻家驷即兴赋诗《欢呼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诗中写道：

“四人帮”黑党，恶贯满盈；一网打尽，大快人心。
英明果断，扭转乾坤；主席遗志，后继有人。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得道多助，天下归心。

著名作家沈雁冰激动地说：历史的证据就是全国各地广大群众连日举行的庆祝游行。这样遍及全国各地的欢欣鼓舞的数千万人的游行，将永远载入史册。

胜利了的人民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胜利的陶醉，他们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医治极左错误造成的创伤，使我们的民族尽快地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来，迅速开创新的生活。

这时，人们最关心的是两大事件，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的两个冤案，也是两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1975年初，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面对复杂而困难的局面，以大无畏的勇气，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对军队、工业、农业、科学、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整顿，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通过整顿，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工农业生产都比上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是希望邓小平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对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邓小平的做法更遭到江青一伙的强烈反对。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情加重。9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情况的汇报。说什么“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

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远新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认为，这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原省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信中揭发了迟群和谢静宜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的，这本来是党内生活的正常做法，可是毛泽东在10月下旬的一次谈话中，却错误地认为这件事情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①

11月3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会上转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批评。11月18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的所谓

^①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4页。

“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问题，矛头实际上是指向邓小平的。

11月8日，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责令周荣鑫作出检查。周荣鑫指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亟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这才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并当场质问周荣鑫，“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①不久，王洪文又有意给他们在上海的爪牙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华国锋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通报》。《情况通报》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指出：“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展开。邓小平主持的持续9个月的整顿工作为之中断。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了1975年经过各方面的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局面，整顿中提出并施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

^①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措施受到错误的批判，一些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受到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用，一些地区（如河北省保定地区）的派性和武斗重新泛滥。工业完不成计划，一些地区停工停产，一些铁路枢纽陷入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事实证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完全错误的。

正当“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浊浪滔天之时，1976年1月8日，传来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这时，“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疯狂“批邓”的同时，极力压制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

1月9日，于会泳一伙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并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迟群、谢静宜则在清华大学大肆散布，“目前主要精力是学习，是批邓”，还说，“你们不要悲痛嘛，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同日，王洪文在给上海的电话中说：“化悲痛为力量，首先是批邓。”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的文章，题为《孔丘之忧》，借“忧”字大作文章，把悼念周恩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污蔑为“哭丧妇”。文章恶毒地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3月5日，《文汇报》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纪念雷锋、学习雷锋的新闻稿，竟将周恩来为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去。

3月25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新闻稿《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露骨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从3月下旬开始，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进行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3月26日，南京市的学生、工人举行游行示威，首先起来揭露和声讨“四人帮”操纵《文汇报》制造的反对周恩来的事件。他们贴出“《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张春桥！”等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

与此同时，杭州、郑州、西安、太原、遵义、昆明、重庆、青岛、天津、长沙等许多城市也都出现了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

在首都北京，3月下旬到4月初，上百万群众连续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诗词、悼文，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恩来和革命先烈的悼念之情，表示拥护邓小平的领导，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许多诗词、悼词和演说指出江青、张春桥等人是祸国殃民的野心家。

3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小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

3月20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位同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悼词。

3月31日，“四人帮”在北京市的亲信派出“便衣”观察动态，记录小字报、诗词。

4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公安局会议上说：清明节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还说：“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同一天，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诗，被“四人帮”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

4月1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当前势态。会议认为，全国各地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

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4月2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将制造的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109厂职工将四块巨幅诗牌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高大的铁花圈和巨幅诗牌格外引人注目。

就在同一天，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的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联合指挥部”成立，并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随时准备出动镇压群众。当天下午，刘传新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常委会议，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镇压群众的具体措施。

4月3日凌晨4点40分，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筒看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圈和悼词。回去后，立即给在公安部的党羽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姚文元看了《人民日报》编写的《情况汇编》后，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4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广场上空两束气球悬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地上摆满了花圈。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数达200万人次以上。纪念碑东侧接连贴出了《清明节呐喊》、《叫人怎么办》等诗词。9时许，纪念碑东南角出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传单，传单公开点了江青的名，“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立即以《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把传单内容抄报“四人帮”。刘传新奉

命进行紧急部署，要求做到“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问题。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关于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汇报后，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5日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条幅、诗词和挽联被洗劫一空。花圈由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出动200辆汽车运往八宝山销毁，小部分放到中山公园留下当作“罪证”。在清理广场时，57名在场群众均遭审查，其中7人被捕。

清晨，当拥向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发现花圈被收走，看守花圈的人被抓走，无比愤怒，他们高唱《国际歌》，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了抗议行动。

下午6时许，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吴德的广播讲话。他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9时30分，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广播声中，1万名民兵、5个营的卫戍部队、3000名警察封锁包围了天安门广场，他们用木棍殴打留在广场上的群众，许多人受伤，38人遭到逮捕。

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关于邓小平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个小时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政治局的两个决议和由“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和爪牙赶写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诬称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说“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就这样，一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发生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4月5日镇压后，在“四人帮”指使下，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疯狂的追查，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诗词、悼文照片、抄件和现场照片10.8万多件，从中选出重点600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共计立案追查的达1984件。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群众388人，北京市受到审查的群众数以万计。

很显然，作为人民群众自发行动的四五运动，是广大干部群众长期以来对“文革”、对“四人帮”以及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怀疑和政治上的成熟。正如运动的参加者所指出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①

^①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第430页。